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CONTEMPORARY MARXISM REVIEW

第一辑

NO.1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The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Marxism abroad
Fudan University

复旦大学出版社

A81 71t
F96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第一辑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编



A0934633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7

ISBN 7-309-02587-3

I. 当… II. 复… III. 马克思主义-研究-世界-现代-文集 IV. A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5435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江苏大丰印刷二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300 千

版次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论 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 在当代的相遇

杨 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性，后现代

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必须充分阐发其后现代意蕴。本文首先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及其实质。接着探讨了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最后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些思想体系，它们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却并非专属这个时代，相反，它们具有跨时代的症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属于这些为数极少并且具有恒久魅力的思想体系。一种仅仅适应某个时代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如果马克思当初不是有时超越他所生活的 19 世纪后半叶的话，他就不可能

在 20 世纪后半叶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仍然这样重要。”^① 的确如此。马克思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作了“准确”的预见^②;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唯物主义,但它又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现代”中露出的“后现代”端倪,并对其加以批判审视。因此,兴盛于 20 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漠视产生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后现代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座从现代走向后现代必经的思想桥梁,是“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③。尽管我们无法泛泛而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在当代的相遇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具有后现代意蕴,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必须充分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意蕴。

一、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及其实质： 重写现代性

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状况的不同体认。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现象,这些现象传统概念无法涵盖,现代观念也无法解释。哈桑由此认为,这是一种需要区别于现代主义的现象,可用“后现代”来

①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41 页。

② 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66 页。

③ Fredric Jameson: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XI, No. 1, Autumn 1979, p. 42.

命名这种现象。的确如此。德里达、利奥塔德、拉康等人都注意到这种需要区别于现代主义的现象,并对此展开种种不同的探讨。尽管这些哲学家、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的探讨尚未能形成一种运动、范式或流派,但却呼唤出一些相应的文化潮流以及知识态度和生活态度。在哈桑看来,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称谓这些文化潮流、知识态度和人生态度,并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主义在其预示性时刻直接或间接瞥见到的难以想象之物所作出的一种反应”^①,其典型特征就是不确定性和内在性。

从形式上看,后现代主义所关注的是观念层面、意识层面的东西,所以,后现代话语信奉“语言游戏论”,即认为语言符号不是实在意义的替代物,语言意义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取决于它对外部世界的再现和表征。然而,这只是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感觉”。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思潮,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实际上都和它所处的时代相联系,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后现代主义也是如此。它决不是空穴来风,对它的认识和分析仅仅通过“语言游戏”是无法达成的。作为一种话语,后现代主义无疑是通过各种理论思潮的交锋以及对人文传统的解读逐步展开的,但后现代主义或者说后现代话语的崛起,毕竟是在一定的历史基地上发生的。因此,只有把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置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才能得到较为明确的阐释和把握。

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其现实性上有两大根源: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是科技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如果说前者使西方社会对理性观念、人的自我控制、社会进步等信念发生怀疑,后者则使西方社会对由于知识增长而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分裂、人的萎缩乃至分裂产生迷茫和恐惧。一句话,资本主义进入“晚期”之

^① Ihab Hassan: *The Postmodern Tur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9.

后处于破碎分裂、“礼崩乐坏”之中。无论对其进行维护也好,批评也罢,资本主义犹如一列急驰的火车,一如既往,按照既定的轨道行驶下去。这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不仅“合法化”了,而且被定于一尊,变成“铁板一块”,“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即忘记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性,从而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权威。于是,在“后现代”问题上,当代西方的思想家们又一次聚集起来,为日渐病入膏肓的资本主义社会“急诊”,并再一次开出药方——“向同一性开战”。因此,杰姆逊指出:“最稳妥地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办法,就是把它看作是在一个已经在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里去历史地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①

后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从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后现代话语正是通过对现代主义、现代性的解构,展现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基本脉络。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的运作始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从历史分期的角度提出“现代”这一概念,以和古典时代相区别。在法国启蒙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现代”这一概念内蕴着进步,而进步则意味着理性、秩序、自由。从历史上看,现代建立起来的关于理性、自由、进步的宏伟叙事与席卷西方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以及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是同步进行的,尽管不能把现代性或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但毫无疑问,现代性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才得到充分的展现和演绎。因此,表征历史分期的“现代”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是相促并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奥塔德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②。在我看来,后现代话语中的现代性就是指这种关于现代的观念。

①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p. ix.

②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建构“现代”概念谱系的过程中,探讨了现代/后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些相反相成、相辅相成的概念分野的实质。

哈桑在谈到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无深度性、非原则性等特征时指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铁障”或“长城”,因为“历史是可以抹去旧迹另写新字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渗透着过去、现在和未来”^①。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而来,它与现代主义是并蒂共生的统一体。“历史是可以抹去旧迹另写新字的羊皮纸”给我们的启示就在于,“现代”与“后现代”并不具有一种本质的差别,而是“可以擦掉重写”的一种建构,它取决于阐释者的理论视角。

利奥塔德明确地返回到现代主义潮流中去把握后现代主义。按照利奥塔德的观点,后现代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这是因为,“后现代”就是把那些在“现代”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设法加以表现,使之以一种“无形”转变为“有形”。这样理解之后,后现代主义就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一再出现。据此,利奥塔德强调,后现代并不意指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一些特征的“重写”,而且这种重写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进行很长时间了。从根本上说,利奥塔德之所以坚持后现代永远被包含在现代之中,就是因为他通过对现代性历史的审察认识到:现代性本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达成一种不同于自身的冲动;现代性不仅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要将自我融入一种终极的稳定状态。所以,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地孕育着后现代性。

当利奥塔德致力于重写“现代性”时,哈贝马斯则希望“重振现

^①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代性”。哈贝马斯看到了西方现代文化面临的危机,并通过对黑格尔以来的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进攻历程的探讨,揭示出后现代思潮的核心就是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语言深层结构性所进行的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性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西方社会,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使命尚未完成,生命远未终结。因此,应固守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同时纠正其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建立新的理性图式——交往理性。显然,哈贝马斯是为了坚持、修正从而弘扬启蒙主义理想,即用启蒙主义“关于现代的构想”来探讨“现代性”的,这一点与利奥塔德不同。

然而,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界定在本质上又与利奥塔德出于同一个理论视角。在利奥塔德的视野中,“现代性”是指一个社会中的知识话语活动可以参照某种宏大叙述,建构起自圆其说的一套游戏规则,从而使这种知识话语具有合理性。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现代性”就是自己给自己确定原则,而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叙事来为自己的存在取得合理性或合法化。可见,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与利奥塔德的“重写现代性”在认识角度上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利奥塔德“重写现代性”的努力与哈贝马斯“重振现代性”的信念之间的对立,就没有根本性的或者说基础性的意义了。实际上,利奥塔德与哈贝马斯都认为,后现代是置身于现代之中运作的。所以,利奥塔德与哈贝马斯之间的论战,以及70年代以来欧美学术界的“后现代主义论战”首要的意义就在于一种话语建构。正是在这种后现代话语的建构中,现代话语也同时得以积累和增殖。

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重写现代性”。但后现代主义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现象,其中运用与滥用同在,建设与颠覆并存。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不再假定有一个绝对支点可以使真理和

秩序合法化,不再相信所谓先验的权威叙事,也不再相信所谓天生的等级制度,而是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自己所构成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是由对话而沟通,一切意义都是由解释而生成,一切认识都是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并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演绎理论。

二、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是当代“不可超越的视界”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审视和反思,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因此,在审视和反思现代、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很自然地在后现代语境中浮现出来。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德、杰姆逊等,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示出充分的重视。从中,我们可以把握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现代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反对任何“形而上学”。可以说,反对“形而上学”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共识。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并认为马克思完成了“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①

德里达指出:“如果有一种我永远也不准备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那么它不仅仅是批判的精神和质问的态度……它毋宁说

①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60页。

是某种对于解放和获救的肯定,是某种许诺我们可以设法摆脱任何独断观念,甚至摆脱任何形而上学——宗教的预定,摆脱任何救世福音的体验。”^① 在德里达看来,没有马克思就没有未来,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

福柯认为,支配法国乃至当代批判思想的三个基本来源是尼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这三位大师各自发挥了一种根本性的“解中心”作用,共同开辟了当代解释学的道路。福柯“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分析并不是“建立在任何 18 世纪模式的基础上”,相反,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揭示了一个“全新的话语实践”;“在现时,写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马克思所定义和描写的思想地平线内,那是不可能的”^②。

在利奥塔德看来,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个“形而上学的符号了”,“马克思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之中。”^③

杰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什么“唯生产的、简约的、过时的整体论话语”,相反,它是一种更为宏大深刻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当今用以恢复自身与存在之间关系的认知方式”。在杰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那些互不相容,似乎缺乏通约性的批评方式各就其位,确认它们局部的正当性,它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而“其他批评方法的权威性只是来自它们同某个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

① 参见《未来不能没有马克思》,《东方》1996 年第 6 期,第 69—73 页。

②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0, p. 21.

③ 利奥塔:《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48 页。

或者同迅速增生的复杂上层建筑的某个亚系统的一致性”^①。因此,当代任何一种批判理论都无法避开马克思主义哲学,都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而不见。对于当代批判理论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视界”。

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各异,取舍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存在论意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这些被人们所忽略的方面得以凸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直接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西方思想界通常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它沿袭了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主题,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基质为目标,力图从一种“终极存在”、“初始本原”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颠倒了柏拉图主义”并“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终结”。这一见解凸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相符。

“纵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有所变化的形态始终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②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批判柏拉图主义,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又促使马克思批判整个“形而上学”。研读《神圣家族》可以看出,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

①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0.

②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9页。

面批判了“形而上学”，并认为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把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形而上学的全部财富只剩下想象的本质和神灵的事物了”^①。在马克思看来，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关注的是脱离了人及其活动的宇宙本体或“终极存在”，不仅“本体”在其中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而且人本身也成为了一种抽象的存在，人和人的世界都消失了。因此，应“否定现存的哲学”并“消灭哲学本身”^②，即“终结形而上学”，使哲学面向“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关注“人类世界”。

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拒斥“形而上学”并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即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关注着“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为了占有“全部真理”，而是无限地追求真理；不是“为千秋万代而营建”，而是“为他们自身的时代而拆解”。在马克思这里，“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实践范畴仅仅被作为认识论的范畴，在认识论之外，即使提到实践范畴，也只是一种应酬式的热情。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则强调实践的存在论意义，认为马克思对社会生活实践本质的强调，旨在突破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谱系，以立足于从人的活动来理解社会存在。应该说，这一见解深刻并具有启示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的确具有存在论意义。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实践是一种原创性活动，人通过实践进入到存在的组合中，并以自身赋予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从而使存在具有“为我而存在”的性质；人通过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在物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重建世界，实践因此构成了现存世界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1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页。

以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存在于认识论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是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与统一的基础,“实践”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社会的本质和人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相统一的基础,“实践”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

正因为实践具有存在论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来考察和理解人类世界,来审视、评价和改变以往哲学的范畴和规范。只有把“实践”作为主旋律导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宏伟的交响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才能表现为美妙的和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同时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确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必然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中预见到“后现代”,即当代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因而它与西方当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同时,西方当代哲学的其他流派都是从人类世界的某一侧面、某一环节、某种关系出发,并把人类世界归结于这一侧面、环节、关系,因此它们并未从根本上、整体上把握人类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抓住了人类世界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向人类世界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关系发散出去,其本身成为一个思维整体,因而成为当代西方哲学“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话来说就是,西方当代哲学的其他流派只是同“零碎生活的局部原则”相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提供了“整体社会的视界”,它让当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各就其位”,“既消化又保留了它们”,因而“不可

超越”。

当然,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乏微词,其主要批评包括两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烈的怀疑、批判精神,但它又能够被整合为统一的理论体系,被作为某种政治的思想基础和行动纲领,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元叙事”,从而难以逃脱保守和封闭的命运。(2)马克思主义哲学倡导实践的首要性,强调人的现实性及生活的多元化,但它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性解放的学说,仍是一种“宏伟叙事”,从而导致对于统一整体的偏执和对异质成分的压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认识框架,但对作为一种认识范式的“结构”过于迷恋和依赖,因而对犯罪、疾病、孤独和死亡等人类生存的基本困境涉猎甚微,等等。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褒与贬,公正也好,偏颇也罢,对我们来说,其意义主要在于其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重新直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某些被忽略、乃至被遗忘的成分得以“苏醒”;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把握游离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观点,从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自由和必然关系以及人和自然、东方和西方关系的论述,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零散、疏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强调其方法而非结论,重视其思路而非体系,赞赏其某些片断而非整体。更重要的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某些成分的强调,其意图在于对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解构。因此,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变得支离破碎,不再具有一以贯之的统一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的“后现代”

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行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如前所述,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同“后现代”联系起来的是丹尼尔·贝尔。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中,贝尔认为,马克思曾“准确”地预见到“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贝尔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尽管没有“后现代”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蕴含着“后资本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所以,“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概括地说,“后资本主义”侧重于社会政治、经济的思考,预示了社会革命的可能和前景;“后现代”则侧重于对文化、观念、知识状况的思考,蕴含了改造的目标和可能。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理论或意义理论的阐发,可以看出,“后资本主义”与“后现代”之间呈现出既排斥又融合、既平行又交叉的微妙局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没有“后现代”概念,但其中不乏后现代思想,并具有后现代意蕴。

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态度。所谓元叙事,是指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纯思辨理论叙事”和法国启蒙主义的思想传统——“自由解放叙事”,前者注重同一性价值的思维模式,后者注重人文独立的思维模式,两者联合起来,共同为制度化的科学研究服务,为占有“全部真理”和追求永恒正义辩护。但始料未及,辩护的结果与“元叙事”的初衷构成绝妙的讽刺:理性极度膨胀,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科学突飞猛进,人文世界却趋向僵化窒息。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创立之初,就致力于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的批判。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一段话,代表着他和马克思对黑格尔式思想传统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统

的共同看法：“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①。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和“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的目光关注着“现存世界革命化”，关注着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如何成为“一门科学”，趋向着“有个性的个人”。在针对“元叙事”的怀疑和批判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具有相通之处，并具有“后现代”指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都是对现代性及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凸现出持续变革中的危机色彩，即“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合法化危机”，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在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时就揭示了“资本主义持续变革的逻辑”，并极富预见性地阐述了资产阶级时代所面临的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② 利奥塔德由此认为，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4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